

● 王山译



● [德] 洛伊宁格尔 著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中国的经济问题

● 中国的农民问题
●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 未来中国领袖探讨



D61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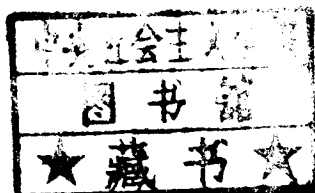
91682

D688/1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 洛伊宁格尔 著

王 山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 号

书 名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作 者 〔德〕洛伊宁格尔
译 者 王 山
出版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光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03-02926-3/G · 1208
定 价 8.80 元

内部发行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发行者退换)

出版说明

L. 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8——)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评述,对西欧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作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最重要著述。书中力图从研究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过程出发,找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合理性,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矛盾冲突的具体演变形式作出描述。以“第三只眼睛”相标榜,意味着作者既不愿重复中国人自己的立场,又竭力与西方仇视中国的传统观点有所区别,从而客观地提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总结。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后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发动者的善良动机作出了不同于我们的结论,但是仍表现出作者力求公正的立场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书中对中国社会一再发生的青年风潮也作出了独特的见解。

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如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和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作者的观点都带有明显的悲观倾向。好在洛氏在他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部份更正，我们将陆续把这些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

王山

一九九三年十月

内 容 提 要

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国际干预的原则：绝不在失控的核武库周边建设自己的家园。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吗？

在结束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曾力图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 中国公民忠告邓小平：你是善良的，但是你在空想。

误区，全面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与两位总书记的解职。

12 亿中国人会在政治上发生分裂吗？

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将引发历史的灾变。

第二章 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 中国共产党兴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失败于农民问题吗？

解决农民问题的两个方案——禁烟与解放。

毛泽东的大手笔：把农民牢牢地钉在土地上 30 年。 历史将解开这个迷，农民与毛泽东，究竟是谁背弃了谁？

为毛泽东辩护：文化大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邓小平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方案。 农民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击中目标，又会伤害自己。 释放农民，必须作出痛苦的交换。 多米诺效应。

流民潮与犯罪潮。

出于贪婪或创造财富的欲望，农民能做出一切，你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现代保甲制度，可能的选择。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知识分子的卑劣、盲目与不成熟。 谁更应对 1957 年的事件负责？

毛泽东的失望与愤怒。第二巴掌狠狠地拍在了彭德怀的头上。

反叛者，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 只有一个小人物理解了毛泽东。

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思考与隐忧。

西单民主墙。

旧式民主活动的终结——1989 年北京事件。

第四章 中国的干部问题

中国的阶层分化。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权力异化是无条件的。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如同把女儿嫁给了魔鬼。

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均等地从改革政策中得到利益吗？

背叛毛泽东的证据：没有人对改革作出阶级力量的对比分析。

邓小平含泪的妥协，是为了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的有趣现象，改革的每一步突破都是以直面道德堕落为起点的。

一个难堪的结论：改革的结果是不断累积的社会分裂。

唯一的选择，坚决制约权力。

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改革的要义就是部分地背叛或复辟。 中国的第三代领袖起自于“复辟”行动吗？ 怎样继承邓小平？ 何时回归毛泽东？

不要迷信法制。

另一个误区：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目标的一致性。
谁是最凶恶的敌人？ 中央政府专政。秩序的保护神。

中国正处在阶级分化的第一个阶段。 阶级分化的社会特征和前途。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扩军，为了应付社会战争。 地区紧急状态与军管，可行的选择。

工作队再度接管基层政权？

前进道路上的五个陷阱。 两个法宝可以兼得吗——党专政和百家争鸣？

历史对中国人的厚爱，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世界的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条件。 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作出理性分析。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冲突将在何时爆发？

第一章 不要干预中国

内容提要： 世界政治斗争的新特点：对内政的干预。 中国是一个控制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吗？ 国际干预四原则。 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原因及后果。 毛泽东与邓小平。 经济发展过程中断是干预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吗？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自然的成长中的过程。

世界冷战格局被打破以后，令各国政治领袖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就如同夫妻分室而居而家庭完整又必须维持，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要为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建立一套行为戒条，当夫妻终于和解或因一方死亡旧家庭不复存在，这些行为戒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父党或母党的成员仍将继续引用这些旧戒条作为庇护自己的武器，而如果这些戒条由于长时期实行已经成为家庭道德的准则，那么家庭冲突的新形式就是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较量与碰撞。

不难理解，当握有足够几次毁灭地球人类的核武器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时，当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分属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或利用这种对峙得以保持中立时，世界

处于平衡状态。这时维护人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维持平衡。为了维持平衡、维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戒条作为行为规范。其中，国家间关系准则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国家间关系准则的要点。

一旦冷战结束，上述各原则立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力量。当美军出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时，我们在国际上仍能听到虽然微弱但很清晰的“不许干涉内政”的呼喊；当美国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封锁时，这种呼喊已经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呻吟；最后，对战败的伊拉克内政的干涉、制止索马里内战、检查北朝鲜的核设施、出兵柬埔寨以及制止波黑共和国的内战等行动，已成为全球各大国和所有国际团体的统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全是针对一国内政的，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以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容侵犯为理由加以反对。

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旧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必将为新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取代。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除了政治家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完全不能相互信任之外，在社会一般公众的心目中，对方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也是明显荒唐而不能理喻的。

1989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后，北京的一位中学生的文章被纽约的报纸转载了。这位15岁的少年对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行动表示了深深的不理解和强烈的愤怒。他说：“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少年的文章以更强烈的指责结束：“我们的家庭正在平静地生

活，邻居们为什么不愿与我们和平相处，反而要干预它，破坏它，挑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

少年的意见天真而又直率，他的话显然比中国官方的郑重声明之类的东西更强烈地震动了西方公众的心。面对孩子的呼吁和指责，西方公众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但是这并没有促使西方社会和公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预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说，必须挽救中国的下一代人。

在不同社会生活的人们常常会就一般性道德问题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仅仅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的，更主要的是由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见解造成的。干预邻居的事务，究竟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是这件事情（指对中国的制裁行动）的本质所在。

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被中国一般民众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看作是老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表露，是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并行的政治侵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部分真实。因为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发动的几次对华战争中曾大肆掳掠了中国的财富、领土。而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前的3年内战时期，美国作为调停人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时，其所作所为不是大失公允就是公然偏袒一方，而这种偏袒又由于被袒护的一方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而使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又在朝鲜半岛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台湾海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证实并进一步强化，从

而成为中国公众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传统的政治心理。当他们带着这种仇视或被虐心理去看待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带有历史伤痛的印记而往往偏离这些政策的初始用心和目的，从而构成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长期隔膜的格局。

由于第二次大战以后全球的政治运作主要由共产主义的扩张与反扩张、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作为主流性内容，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例证来说明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华政策的善意性以及这种善意被粗暴曲解的情况，一切举措都带有冷战、颠覆、利用的痕迹。但是美国于1971年尼克松总统任内主动打破僵局，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在以后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特别是在中苏发生全面对抗的紧急时刻美国帮助并保护了中国免遭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些事例虽仍有战略利用之嫌，但是带给中国的好处却是明显的。给邻人以好处，帮助它的发展，应该被公正地评价为善意行为。

干预中国，是不是善意行为？1989年北京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公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甚至极不光彩地支持它内部的不得人心的青年反叛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国际干预的原则及其出发点

西方的现代安全概念几乎全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经历的总结性认识；二，对核武器时代毁灭性全球战争的恐惧及防止手段。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是痛苦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出现，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全世界都拖入一场

血与火的战乱，人类为自己的这一次错误付出了3亿人的生命代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仍可称为相对的冷兵器时代，他用以屠杀人类的工具还仅限于坦克加大炮再加螺旋推进式飞机。类似的错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其结果必将是人类自身的完全毁灭。

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引发这种世界性灾难的原因提出许多问题。

第一，希特勒上台掌握德国这架战争机器是一种偶然现象吗？这种偶然还将再一次发生吗？

历史学家们举证出无数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巧合和错误，以及这些巧合和错误的更偶然的排列结果，才使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血统卑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着无数偶然和历史错误怎么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或者说，这种机会发生的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

问题在于，几乎等于零并不是零，人类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的环境。事实上，这一次偶然毕竟导演了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下一次偶然发生时，人类还能存在吗？从单细胞生物演化为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终挣脱地球的束缚走向广阔的宇宙，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艰苦历程。如果任由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一再发生，这一进程只好半途夭折了。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押上运气和机会的赌台。

第二，消灭这种偶然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机制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这个被今天的病理学家诊断为精神偏执患者和被虐狂的人掌握

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阻止他控制战争机器的启动手柄。相反，容克地主的掠夺欲望、大军事工业集团的侵略野心、德意志民族的复仇心理和工人群众的狭隘的愤怒情绪，这些因素共同浸染和改造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控制体系，从而使该控制体系成为一个筛选器，从几千万个机会中筛选出希特勒及其党徒。经过国家控制体系的工作，偶然已经成为必然并进一步成为现实。

全部问题都在于国家控制体系。世界大家庭是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的。每个国家都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族情绪偏执者、宗教狂热者以及政治失意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不能阻止他们的臆想和野心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姑且不去谈那些核俱乐部成员国，如果仅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国家机制如果不是阻止而是保证一个鼓吹国际恐怖、宗教偏执和贩毒的独裁者安居其位，这个世界也将是不安全的。

那么，核大国呢？我们发现，全球的安全和人类的命运竟悬系于一个国家的控制机制的安全功能和健康程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控制机制的问题上，没有国家边界，也不存在纯粹的内政的概念。

第三，在上述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干预权力和责任。

这个问题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干预行动，特别是通过干预某一国家的控制体系和控制过程而实现的积极干预或霸权干预，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道德原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不仅反映在集体安全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决权力的对抗上。更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民族的自然发展状况、过程和阶段性特征往往与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相违

背。屈就前者，等于放弃国际干预的原则；而独尊后者，必将是现实的对抗与战争。越南战争的教训足以让国际社会记取一千年。

这是人类遇到的许多两难选择的又一例。解决这个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国际干预的前提下又对它进行最严格的限制，既限定它实行的范围，又限定它实行的手段。

在现阶段，国际干预实行下列原则：

a. 仅当一个国家推行的国际政策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时才可以进行干预；

b. 干预的对象仅限一个国家的决策方式模型；

c. 以经济限制或援助方式诱导该国决策方式模型的演变及合理化；

d. 非危急时刻不得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军事干预的结果不应是强加于一个国家某种决策模型，而仍是诱导这种合理模型的自然生成和发展。

二、对中国的失败的干预

1989年国际社会由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这不仅是一次失败的国际干预，而且已酿成一个笑柄，彻底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幼稚、盲目和不自量力。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次行动根本违反了国际干预的各项原则。

北京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竭力表现出成熟的风度和克制态度。即使如此，北京官方披露的事实材料和美国舆论界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北京学生界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各国的政界、商界和思想界鼓动、支持甚

至策划发动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干预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种干预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善意性干预和帮助，那么下列各项结果却恰恰与发动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a. 中国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北京事件的发生而中断，并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不会再度起步，或根本无法再达到 1989 年已经达到的前进点。

b. 鼓吹并实行政治制度革新的领导人被证明是犯了“错误”而失去对权力的控制。随着新的领导集团的产生，政治改革派作为当时颇有实力的一种自然的政治力量已经消失。

c. 国际干预所显露出的颠覆手段和干涉意识，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刺激了执政的共产党的警觉性，而挑动闹事所形成的社会混乱又给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权力控制提供了反面对照物，中央集权已经成为全民公认的可行的国策。

d. 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的中国青年民主派知识分子，从他们在北京事件中的表现以及流亡后的表现看，他们绝不是中国政治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这些人的民主意识极其淡薄而叛国和反民族情绪强烈，如果北京事件演化成一场成功了政变，中国的权力由这些青年掌握了的话，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也将是世界灾难的根源。

e. 国际干预在中国失败以后，中国不仅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困难，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投资场所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